

神木新华遗址出土 玉器的几个问题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54)

Abstract: Based on 32 pieces of jade articles excavated from a jade pit of Xinhua site in 1999, the article researches the relevant questions such as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jades and thinks these jades of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including Shimao jade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over the Northern Shaanxi belong to the jades of Xia dynasty.

Key words: Xinhua site; jade articles; No. 1 pit; Shimao; sacrifice; Xia dynasty.

摘要: 1999 年新华遗址发现了一座玉器坑 K1, 出土了 32 件精美玉器。本文以新华玉器坑 K1 性质、玉质及工艺等相关问题探讨为出发点, 从考古学角度对玉器所属的考古学文化性质、特征及分布地域分别加以讨论, 进而将包括石峁玉器在内的陕北地区所谓龙山时代晚期玉器较为可靠地确认为夏代玉器范畴。

关键词: 新华遗址; 玉器; K1; 石峁; 祭祀; 夏代

中图分类号: K87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731(2002)05—0037—06

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县西南大保当镇东北的新华村附近一个名叫“彭素圪塔”的土丘之上, 距石峁遗址约 20 公里。遗址中心分布于彭素圪塔高坡上, 长约 250 米, 宽约 120 米, 总面积约 30000 平方米。遗址周围为平缓的沙丘和坡地。由于常年水土流失严重, 遗址地表上裸露着大量的陶片, 并可零星采集一些细石器、骨器等遗物, 在一些断崖旁边可以观察到灰坑、窑址、房址的遗迹。遗址附近有间歇性河流——野鸡河流经。野鸡河是秃尾河的一条支流, 秃尾河最后汇入黄河。

1987 年, 为了配合神府煤田的开发, 艾有为对神木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当时在新华遗址采集到了两件玉环^①。1996 年和 1999 年, 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工程——陕京天然气输气管线和神延铁路的建设,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处于工程建设区的新华遗址进

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②。在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一个玉器坑, 出土了 32 件精美玉器。本文试以新华玉器坑 K1 出土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为出发点, 进而对包括石峁玉器在内的陕北地区出土的所谓龙山时代晚期玉器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分布地域及玉器时代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玉器坑 K1 及其性质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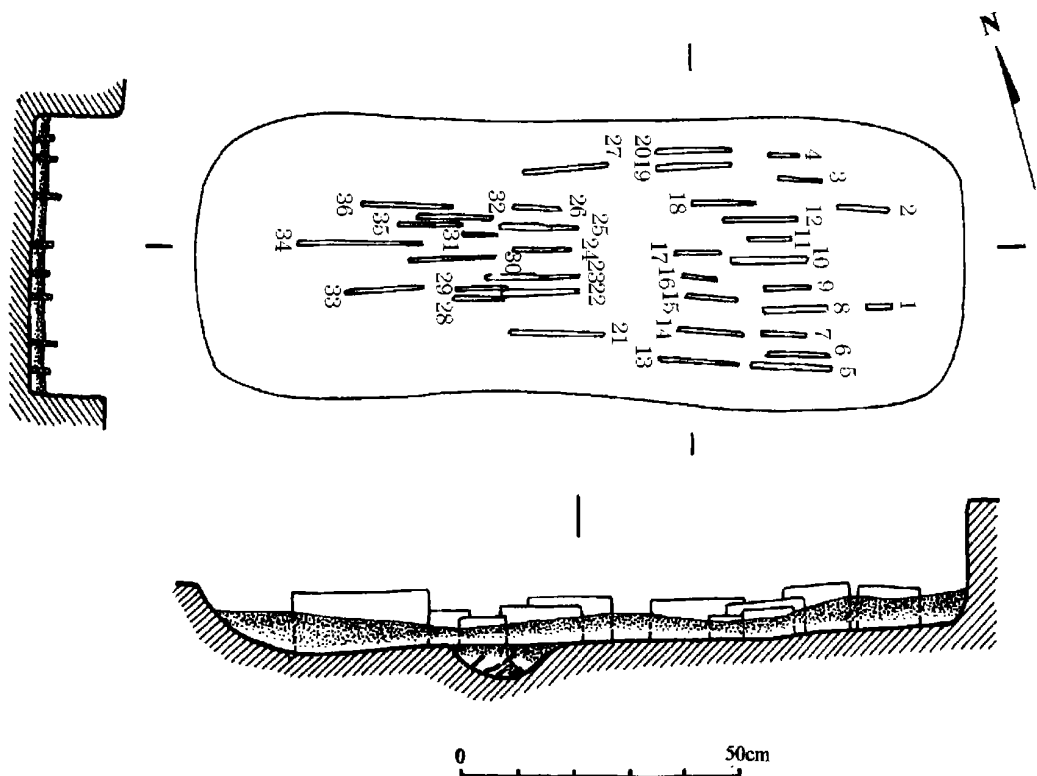
新华遗址玉器集中出土于一个鞋底形的土坑之内。该坑位于整个发掘区西北部的 T0812 东隔梁下, 是在整个区域发掘基本结束, 统一打掉隔梁时发现的。由于 K1 显露时, 其坑口平面形状似一座墓葬, 是故工地编号为 99SXM18, 整理时调整编号为 99S XK1。(图一)

K1 开口于①层下, 开口距地表 0.12 米, 打破生土。平面形状呈长方形, 两短边弧凸, 两长

收稿日期: 2002—03—09

作者简介: 孙周勇(1972—5), 男, 陕西宝鸡市人,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一 玉器坑 K1 平剖面图

1、3、6、13、14、19、24、27. 玉钺 2、9 残片 4 玉环 5 玉筭形器 7、10、11、15、16、23、28、30、33、34、35、36. 玉铲 8、22 玉璋 12、18、21、25、32 玉刀 17、26 玉斧 20 玉佩饰 21、31 玉璜

边略向内凹成近亚腰型。坑壁未经进一步加工,显得较为粗糙,个别地方略有坍塌损毁。坑底平整光滑。坑底中央有一个小坑,圆形圆底,直径 0.18 米、深 0.05 米。小坑靠近底部发现有少量鸟禽类骨骼,骨质纤细脆弱。K1 东西长 1.40 米、南北宽 0.46 米—0.50 米、深 0.12 米—0.22 米。K1 内填土呈黄灰色,土质较硬,夹杂少量沙石粒及碎陶片。K1 内共埋藏有 36 件玉石器,均竖直侧立插入土中,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无刃部者其薄面朝下。36 件玉石器分 6 排排列,每排插置器物数量不等,多者 10 件,少者 2 件。器物与器物之间基本保持平行。K1 内出土的 36 件玉器中,1 号、3 号、6 号为同一件玉钺上残片,11 号、16 号为同一件玉铲上残片,29 号、31 号为同一件玉璜残片。经过拼对粘和后,实际出土玉器 32 件,器形有钺、铲、刀、斧、环、璋等。

总体来说,K1 内出土的玉器形制较为简单,器形不甚丰富。坑内器物以片状器为主,占总数的 85% 以上,许多器物都没有明显的刃部,个别器体极薄,厚度仅仅两三毫米,显非实用器物,当已经具有了礼器的性质。K1 特殊的形制

及整齐规则的玉器排列及埋葬方式,显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K1 坑底中央埋葬鸟禽骨头的小坑,似乎与殷商时期的常见腰坑有着相似的功能或含义。这些现象都表明了 K1 作为一种文化遗迹,可能和当时某种祭祀活动有关。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③中同样发现了与新华遗址 K1 规模相当的处于祭坛遗迹之上的祭祀坑。在祭坛表面发现了 3 处祭祀坑和 4 处积石圈。坑内出土了泥质灰陶盆 2 件、夹砂灰陶盆 1 件,并出土了一小段较细的禽骨。将凌家滩祭祀坑与新华遗址玉器坑 K1 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二者均位于墓地之中,规模相当,埋葬深度接近(排除后期破坏因素),而且都在坑底部出土了纤细的禽骨。不同的是,凌家滩遗址祭祀坑位于规模宏大的祭坛之上,坑内埋藏有陶器,而新华 K1 与房址、灰坑、窑址等遗迹交错分布,坑内不见陶制品,而是整齐地摆放着玉器,且底部专门有一个小坑内葬鸟禽动物。此外,凌家滩祭坛上还发现了大量积石圈,在与新华遗址分布地域相当而时代较早的阿善文化中,积石现象大量出现,多被认为是和祭祀遗迹相关^④。因此,凌家滩遗址祭祀坑及

祭坛性质的确认当不存在问题。新华遗址由于地处风沙盛行区域,水土流失严重,尚未见到祭坛类设施。但是,从相去数千里、相差千余年的不同文化圈的人类遗存在上层建筑方面表现出来的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来说,不能不使人将新华遗址玉器坑 K1 的性质与祭祀活动联系起来。

如上所言,玉器坑位于新华遗址居址与墓葬分布区内,没有相对独立的存在空间,因而将与玉器坑关系密切的遗迹综合考察就成为判断玉器坑性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新华遗址初步研究表明,墓葬散落分布在灰坑、房址、窑址等居住遗迹里,多数打破或叠压这些居住遗迹,极少数墓葬被灰坑、房址等遗迹打破或叠压。墓葬是新华遗址中相对年代最晚的一组遗存,但其时代范围及文化特征均不超出遗址整体内涵,它仍然属于新华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遗址墓葬保持了晋西北、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龙山晚期以来的随葬品稀少的特点,仅在 2 座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的少量玉石器。这 2 座有随葬品的墓葬规模较大,共发现 3 件随葬器物,分别为玉铲、绿松石坠饰、玉柄形器,其中玉铲无论在玉质还是器形上都和 K1 内玉铲相近,而出土于 99SXM27 的玉柄形器与中原地区二里头墓葬中常见的柄形器(二里头 81YLVMM4F2)^⑤如出一辙,形制几乎完全相同。二里头 81M4 的年代被认为属于二里头二期,新华遗址墓葬的年代应该大致与此相当,这与我们后文对玉器坑 K1 时代的判断基本一致。因而相比较而言,从时代来讲,可以认为新华遗址墓葬和玉器坑的关系可能更为接近。K1 周围共环状分布了 M6、M16、M14、M12、M8 等十余座墓葬,这些墓葬要么打破居住遗迹,要么直接坐落于生土之上,不与 K1 直接发生关系。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十余座墓葬头向基本趋于一致,在整个发掘区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墓群,而 K1 恰巧就位于该组墓群的中心位置。这种现象可能表明墓葬主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或是血缘或是家族上的关联,而 K1 则很可能就是新华遗址主人对先祖或地神之类进行祭祀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

那么,这种可能存在的祭祀是否是一种墓祭形式呢?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学术界围绕先秦时期墓上建筑和墓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杨鸿勋先生认为,汉代人所说的“古不墓祭”是错误的,至迟到商代已经有墓祭^⑥。杨宽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先秦时期墓上建筑不

可能用于祭祀,而是陵寝的“寝”是墓主灵魂的饮食起居之所^⑦。显然新华遗址所见的玉器坑 K1 不属于墓上建筑之类,因而不同于以上所谓“墓祭”范畴。考古发掘表明,商代已经大量出现了埋葬人性遗骸的祭祀坑,其性质已被学术界公认。既然如此,处于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新华遗存创造者在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并出现了墓葬规模及等级差别社会现象的同时,采用玉器而不用杀牲来作为祭祀也未尝不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K1 内埋葬的玉器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残器、改制器、半成品,对于珍贵稀有的玉器来说,在先民的心目中占有至高地位,反复利用,长期传承,K1 出现并不完整的器物也不难理解。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的研究尚不能完全排除 K1 作为玉器窖藏的可能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玉器显然已经脱离生产工具的范畴,具有了一般器类难以替代的神秘功能和特殊含义。

二、新华遗址出土玉器制玉工艺和玉质

新华遗址玉器集中出土于 1999 年发掘的玉器坑 K1 内,此外,在同年发掘的墓葬中也出土了 3 件玉石器随葬品,其中包括绿松石 1 件,地层及灰坑里出土残玉器 4 件,加上 1987 年采集的 2 件玉环,新华遗址历年来一共出土玉器 39 件。

新华遗址玉器玉质温润缜密,光泽灿烂,晶莹可爱,制作精美,造型别致而规范。虽然在发掘工作中未发现当时制玉的工具,但是仍然能够从残留在器物表面的一些切割及钻孔留下的摩擦痕迹对当时的琢玉工艺及工具加以推测。新华遗址玉器琢玉工艺综合了研磨、削切、钻孔、抛光等技术。在发现的 32 件玉器中,有 7 件器物表面留下了开料时的锯割痕迹。一类为弧线形痕迹,多形成凹形波槽,波槽边缘有边棱,例如,玉钺(K1F4),在器身一面上保留着一个半弧形的棱脊,它将器表分为两个高低略有差异的平面,据此来看,此器在开料时可能使用了砣锯类工具;另一类为直线形痕迹,比如玉刀(K1:12),其刃部留下一条直线形棱脊,在放大镜下可以明显观察到分布在棱脊周围错综交杂的直线条痕,这类痕迹较为普遍,当是利用某种直线形锯在往复运动切片时,带动解玉砂类物质磨擦所致。

除开料痕迹外,还留下大量钻孔痕迹。钻孔

是新华玉器中普遍采用的技术。在 32 件器物中, 95% 以上都有钻孔, 个别还有 2 个孔。从钻孔剖面来看, 一类为单面钻, 孔壁略呈斜坡状, 整体呈马蹄形; 一类为两面对钻, 两侧均有斜坡状孔壁。从观察结果来看, 单钻使用较多, 且多见于胚体较薄者; 两面对钻常见于胚体略厚的器物上。不论何种钻法, 圆孔基本都呈现出上口较大, 下口略小的现象。观察发现, 钻孔当中可能使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工具。一种为管钻, 孔痕上口规整, 孔壁有螺旋纹状磨擦痕迹, 孔底往往可见毛边或薄薄的小台阶, 当为管钻未透时不再继续钻进而将底口敲开留下的。此类钻孔占大多数, 形制较为规整。例如玉铲 (K133), 其柄端圆孔旁有一个圆圈, 印痕不深, 中间保留着尚未套取的玉芯, 是管钻工艺的一个最好说明。另一种孔痕上口较大, 下口细小, 这种孔当是使用所谓的“钻”^⑧或螺丝状石钻头加工而成。例如玉刀 (K132), 其侧缘上有一个半圆形孔, 孔壁呈斜坡状, 孔壁外围残留有直径约 1.5 厘米的同心圆纹, 上大下小的孔壁及孔壁周围出现的同心圆纹就是这种工具留下的痕迹。尖状钻头在凌家滩遗址已经发现^⑨, 新华遗址虽未见到这种钻孔工具, 但这类孔的形成当与螺纹状钻头有关。此外, 新华遗址玉器中许多器物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光泽度, 周边光滑圆润, 这表明, 新华先民已经掌握了抛光技术并能熟练地应用于琢玉过程中。

对新华遗址 K1 出土玉器中的 24 个标本的成分测定表明, 新华玉器玉质繁杂, 包括叶蛇纹石、阳起石、透闪石、绿泥石、丝锌铝石、大理石等^⑩。其中, 以叶蛇纹石为主, 共 11 件, 占测定标本的 45% 左右, 其次为阳起石—透闪石类, 共 9 件, 占 27.5%。按照玉石学观点, 阳起石—透闪石类矿物即所谓的软玉, 软玉的矿物成分主要由透闪石或偶尔由少量阳起石组成, 有时也有透辉石等其他矿物杂质。透闪石无色, 纯者不含铁或含铁极少, 当成分中铁的含量超过 4%, 则过渡为阳起石, 阳起石因含铁而呈绿色或暗绿色^⑪。新华遗址玉器真正属于透闪石的器物仅有 2 件, 6 件为阳起石, 另外 1 件包含大量阳起石和少量透闪石, 其余绝大部分玉器属于蛇纹岩类玉石。据笔者肉眼观察其余未经测定玉器, 蛇纹石类质地的玉石比例要远远高于已测试标本计算出的比例。蛇纹石类玉石是一种含水的镁硅酸盐, 半透明或微透明, 硬度 4 度—6 度, 比重 2.2—3.6, 其成分中常含有铁、锰、铝、

镍、钴、铬等金属元素杂质, 这些杂质的混入可使蛇纹岩呈现白、黄、淡黄、浅绿、绿、墨绿等颜色^⑫, 是我国分布最广、利用最早的玉石材料^⑬。这类玉石较为著名的产地有辽宁岫岩、甘肃酒泉、广东信宜、新疆昆仑等。对比新华遗址玉器主要化学成分中部分主要元素含量, 比较接近于岫岩玉。但其产地, 却不敢贸然断定与辽宁岫岩有关。学者们多倾向于石岭玉器及延安芦山岭玉器的产地就在陕北或周围一带^⑭。结合陕北地区同期类似玉器出土地域不断扩大及数量增加的现状^⑮, 将其解释为贸易或战争所得显然难圆其说。我们认为, 正如新华遗址出现的大量石质生产工具而现在却在遗址周围根本找不到石头产地一样, 陕北地区或周围当存在着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玉料产地。

三、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年代问题

目前, 在陕北地区大量出土早期玉器共有 3 次, 包括神木石岭^⑯、延安芦山岭^⑰及神木新华。其中, 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仅新华遗址一处。由于玉器具有稀少珍贵的特性, 一般来说, 流传时间长, 器形变化不大, 故不宜直接从玉器本身的演变来断代。那么, 借助于考古学研究方法, 通过对玉器拥有者或使用者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的研究, 就成为玉器断代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 通过对新华遗址考古遗存特别是陶器形态变化的编年研究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测年手段, 可以较为准确而且可靠地判断新华遗址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新华遗址陶器群的主要器形有鬲、斝、盃、三足瓮、罐、尊、甗、盆、豆、碗、杯等, 其中空三足器发达。生产工具中除磨制的石斧、石铤、石刀、石铲等外, 还有大量细石器。细石器种类丰富, 数量繁多, 包括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等。骨器制造业发达, 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骨锥、骨镞及骨匕、骨针等, 显示了这一农牧间杂地带的经济特征。此外, 还发现了大量极具特征的卜骨。从文化面貌上来说, 新华遗址出土的双釜高领鬲、斝、三足瓮、盃、甗、大口尊、高圈足豆等器物, 和游邀早期^⑱、寨峁二期^⑲、永兴店遗存^⑳、朱开沟一至二段^㉑部分标本、大口二期^㉒、石岭遗存^㉓、晋中地区 V 至 VI 期^㉔同类遗存等关系密切, 它们当属同一类遗存, 但其在时代上和分布地域上却有着一定差

异。从其相对年代来讲,新华遗存要晚于游邀早期、寨峁二期、永兴店遗存,而大致与朱开沟一、二段、大口二期文化相当。

新华遗址中与双鬲、高领鬲、三足瓮等伴出的有圈足罐、直口厚唇鬲、单把鬲等器物,这些器物 and 陶寺晚期遗存^②显示出较强联系。虽然这类器物在出土物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从文化因素比较角度来说,新华遗址整体时代应该大致与陶寺晚期相当。新华遗址 H50 和 H14 的¹⁴C 测年分别为距今 4030±120 年、3940±120 年(均经树轮校正),与陶寺晚期测年基本相符或略晚^③。一般认为,陶寺晚期的下限为公元前 1900 年^④。结合以上已有的年代数据推断,新华遗址年代当在公元前 2100 年—1900 年之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代纪年范围是公元前 2070 年—1600 年^⑤。若此,则新华遗址中玉器坑与墓葬所处的晚段遗存自然已经属于夏代早期。这样以来,新华遗址玉器的年代断定也就有了一个判断标尺。就其绝对年代来说,新华遗址玉器已属于夏代玉器范畴。

文物考古学界对神木的认识多源自于石峁玉器之精美现世。相传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神木出土的玉器就逐渐流散到了海外^⑥。伴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神木石峁玉器征集及遗址调查资料的相继公布^⑦,神木石峁再次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文物收藏家和玉器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但由于资料所限,人们对于石峁玉器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过。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作为石峁玉器的“身份”判定提供了可靠的背景资料^⑧,从而使人们完全有理由把石峁玉器视为石峁考古学遗存重要组成部分^⑨,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了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因而,通过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来判断玉器年代等相关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但可惜的是,石峁遗址没有经过大规模发掘,关于其文化面貌及玉器与文化遗迹之间关系缺乏详尽的表述,因而对石峁玉器的埋葬性质、年代等相关问题一直聚讼不休。1999 年神木新华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转机。研究表明,新华遗存文化面貌与石峁遗址内涵基本一致,并且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一发现为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类似文化遗存定位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依据。

石峁遗存与新华遗存属于分布于河套地区的同一考古学文化^⑩。无论从物质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还是遗址所处年代及分布地域上来看,石峁

与新华遗存都属于同一族群所创造。作为代表该族群人社会发展程度主要标志之一的玉制品,无论从器形、玉质还是加工技艺上均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例如,新华与石峁发现的玉器中切割剖片现象普遍;玉质均以大量的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为主,从肉眼观察,这些玉质多呈墨绿色、灰绿色;钻孔现象极为流行。石峁遗址随葬玉器的瓮棺葬,其葬具以三足瓮、盆形鬲、敛口鬲、双鬲、折肩罐为代表^⑪,用于瓮棺葬具的这些陶器是包括新华遗址在内的本地龙山晚期以来陶器遗存的典型代表。晋中地区以三足瓮的出现为标志被认为是跨入夏代纪年的信号^⑫。石峁遗址玉器中出现的牙璋、玉戈等器物是二里头类型的典型器物。据此而论,石峁晚期也已经跨入了夏代纪年,石峁遗址玉器自然也可归属于夏代纪年范围之内。

石峁遗址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器形精美,而且出现了牙璋、璇玑、人头雕像、动物雕像等,显然高出以片状器为大宗的新华遗址玉器一个等级。从大量精美玉器出土的现象及出现坚固的防御石城来看^⑬,石峁聚落应该是龙山晚期以来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的一个中心聚落,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向心结构社会集团的核心。而新华遗址聚落等级相对较低,与属于同一文化圈且基本同时的石峁聚落相比,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聚落规模及等级差异的存在表明,在包括石峁、新华、朱开沟在内的类似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这一社会集团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而且在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孕育着文明起源的先声。进入夏代纪年的新华遗存、石峁晚期遗存延续了本地龙山晚期以来的文化特征,在陶器特征上丝毫见不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因而表明,夏文化的影响在夏王朝建立初期远未波及到河套地区。在距今 4000 年前,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在内的河套地区并未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成为其势力范围,反而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方向。生活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北的“新华文化”人群与夏王朝鼎足而立,这种状况与关中东部地区进入夏代以后的局面有类似的地方^⑭。

① 艾有为:《神木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5 期。

-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新华遗址 1999 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1 期。
- ③ 张敬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9 年第 5 期。
- ④ 孙周勇:《大青山南麓石城聚落初步研究》,《文博》1999 年第 5 期。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 期。
- ⑥ 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 年第 4 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考古》1983 年第 8 期。
- ⑦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 年第 1 期;《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83 年第 7 期。
- ⑧ 北京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 年第 4 期。
- ⑨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编:《凌家滩玉器》图版 136,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⑩ 玉器标本的化学成分测定由西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郭振琪教授完成。
- ⑪⑫ 栾秉:《中国宝石和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⑬ 曲石:《关于我国古代玉器材料问题》,《文物》1987 年第 4 期。
- ⑭ 姬乃军:《延安市芦山岬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 年第 1 期;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 期、第 6 期。
- ⑮ 横山县陈塔、响水沐浴沟、韩岔梨树焉、高镇油坊头等出土了玉刀、玉铲、玉斧(钺)、玉环等,其时代确认为龙山晚期。据笔者观察,其玉质、玉色及器形等与新华玉器大致相同。参见韩建武、赵峰等:《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文物精粹》,《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1 辑,三秦出版社,1994 年。
- ⑯ 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 年第 3 期;又见《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 期、第 6 期。
- ⑰ 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 年第 2 期。
- ⑱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4 期。
- ⑲ 吕智荣:《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及晋北地区寨峁文化》,《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 年。
- ⑳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 ㉑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㉒ 吉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 年第 4 期。
- ㉓ 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 年第 3 期;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 年第 2 期。
- ㉔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 年。
- 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陶寺遗址 1983—1984 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 年第 9 期。
- 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 年。
- ㉗ 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 年第 3 期。
- ㉘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
- ㉙ 仅以耒形端刃器(牙璋)而言,海外收藏有被指认为陕西出自神木的单位有大英博物馆、科隆远东博物馆、哈佛大学萨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参见王永波:《耒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 年第 1 期。
- ㉚ 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 年第 3 期。
- ㉛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 期、第 6 期。
- ㉜ 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 期、第 6 期。
- ㉝ 孙周勇、张宏彦:《石峁遗存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1 期。
- ㉞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 年第 2 期。
- ㉟ 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 年第 4 期。
- ㊱ 据榆林地区文管会乔建军先生见告,石峁遗址周围存在着坚固的石筑围墙。虽然关于其围墙时代有不同观点且未经正式发掘,但笔者认为围墙应该就是石峁遗址外围的一种防御设施,其时代当与遗址年代相当。
- ㊲ 张天恩:《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李丽娜)